

當今世界的利益結構衝突

◎ 蘇鐵丁

一 引 言

在西方論壇的主流學派當中，關於世界範圍內大衝突的理論，長期為地緣政治學說(geopolitics)與意識形態衝突學說所壟斷。隨著蘇聯的解體，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衝突學說自然也日益暗淡。這種學說不僅不能解釋冷戰後可能爆發的世界範圍內的衝突，致命的是此學說也不能解釋為甚麼美蘇之間終於沒能爆發大戰。地緣政治學說卻是經久不衰，追隨者比比皆是。記得有一次美國一位地緣政治學家瓦斯克斯(John Vasquez)，在加拿大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演講，將其理論應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他理論中重要的一條是地緣邊境的衝突。演講提問期間，我問他：「太平洋美日戰爭的爆發是由於甚麼樣的地緣邊境衝突呢？」答：是因為菲律賓。那我們看看當時駐菲律賓的美軍長官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是如何看的呢？麥克阿

瑟道：菲律賓至關重要，因為「它與新加坡一道是保護南邊荷屬東印度群島(印度尼西亞)的石油、橡膠、奎寧、錫等的天然屏障」^①。很顯然，經濟利益是麥克阿瑟的基點，特別是美國在資源富饒的東南亞的利益與潛在利益。

回到我曾提到的問題：為何美蘇之間終於沒有爆發大戰？除其他因素外，使美蘇免於一場大惡戰的主要原因是：蘇聯沒有經濟擴張的衝動，因而在世界範圍內與美國沒有經濟利益上的衝突。

其實一些經濟學家及經濟史學家早已指出世界市場的收縮，區域貿易圈的形成與世界範圍內的大衝突(世界大戰)的關聯^②。

自然，僅僅指出世界經濟結構與大戰的關聯，是不足以說明衝突是如何形成的。但是結構起碼可以給我們提供衝突成因的啟示。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衝突的成因。

在第二、三節中，我將用網絡方

意識形態衝突學說不僅不能解釋冷戰後可能爆發的世界範圍內的衝突，致命的是此學說也不能解釋為甚麼美蘇之間終於沒能爆發大戰。

* 本文根據將於1994年7月在德國Bielefeld世界社會學大會宣讀的論文改寫。

法具體描述世界經濟利益結構的歷史變遷。在第四節中，我將分析結構產生衝突的動因。

二 找尋「生存空間」的方法

引言中提到本文用網絡方法描述世界「生存空間」的歷史演變。網絡方法是由圖論法(Graph Theory)演變而來，近年用於分析小社會環境、市場結構、權力結構等等。自斯乃德(D. Snyder)與克克(E. Kick)1979年用此方法分析世界系統結構後^③，又有史密斯(David A. Smith)、懷特(Douglas R. White)、聶密斯(Roger Nemeth)、布萊格(R. Breiger)等人用此方法描述世界系統結構^④。但此種分析多限於證實世界系統理論中，「中心、邊緣、半邊緣」概念的存在(core, periphery and semi-periphery)。而在具體描述世界生存空間、勢力範圍、抗衡集團時，世界系統論者多用雙邊、多邊國際條約、協議、政治盟友關係等作為基礎。比如〈日美安全條約〉、〈北美自由貿易區協議〉、歐洲共同體等等。比如，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設想世界正在分解為兩大軸心：歐洲共同體與美日同盟^⑤。柏格森(Albert Bergesen)更具體地描述了兩大軸心：一、柏林—巴黎—莫斯科軸心，二、華盛頓—東京—北京軸心^⑥。華勒斯坦並沒有具體談到兩大軸心的衝突，而柏格森直截了當地分析了這兩大軸心集團衝突的可能性。

用條約、政治盟友關係分析抗衡集團的形成是有極大的局限性的。比如在兩伊戰爭中，美國是伊拉克的政治盟友，但在兩伊戰爭後，兩國為了

中東石油，突然反目成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與德國均是軸心國的核心，但是日本並未預先通知德國其偷襲珍珠港的計劃。在德國撕毀了與蘇聯的協議，並對蘇發動突襲時，日本也未守約對蘇聯採取任何行動。

多邊貿易、經濟協定，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區、歐洲共同體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較穩定的經濟關係。但依據這些公開的協定也會忽視這樣一種情況：「生存空間」正在織造起來，而織造者並不願大張旗鼓地用協定來「公開」這一事實。比如，日本在東南亞大量投資以營造出東南亞與日本利益趨同的局勢。《紐約時報》因此而稱馬來西亞總理為「日本代言人」^⑦。

為要了解世界「生存空間」、抗衡集團的形成，進一步直接對世界經濟結構及其歷史演變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在本文中，我們將從貿易入手對此結構進行分析。貿易是與其他國際經濟、政治、軍事關係相關聯的，比如國際投資。赫施曼(Albert Hirschman)早就指出自由貿易與英國海軍的關係^⑧。強權國家把貿易作為政治工具，比用其他關係來得方便順手。比如強權國家經常採用經濟封鎖、貿易禁運手段，這種手段的採用也經常是軍事行動的前兆，或是軍事行動的補充。「生存空間」在本文中具體體現為世界貿易網絡。在具體分析前，我們可以設想網絡結構的幾種可能性：(1)相對平等互換的區域貿易圈的結構；(2)以某一強權為中心的網絡結構；(3)幾個強權所分割了的勢力範圍、「生存空間」；(4)幾個強權的空間相互重疊。

本文將分析1938年、1960年、1990年三個不同歷史時期(二次大戰前夕、美國鼎盛時期、與當今)的世

界貿易結構。1938年的資料來自國際聯盟1942年發表的《世界貿易網絡》(Network of World Trade)⑨。1960與1990年的資料取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編《國際貿易》資料(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⑩。1938年的資料包括100個國家、地區與殖民地之間的貿易數字(貿易矩陣為 100×100)。1960年的資料包括98個國家(矩陣為 98×98)。1990年的資料我們選了所有年貿易額在2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共有102個(矩陣為 102×102)。總共信息量在三萬項貿易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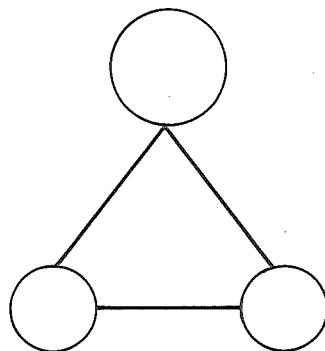
網絡分析方法要求「關係矩陣」(adjacency matrix)中的數字為「1」(表示有關係)或「0」(表示無關係)。自然，無論用何種網絡方法，我們需要首先定義「關係」。

本文對貿易關係的定義是：任何兩國之間的貿易只要佔任何一方貿易總額的10%以上，即定義為「有重要關係」(數字為「1」)。若在10%以下則為「無重要關係」(數字為「0」)。因為三個貿易矩陣均在 100×100 左右，所以隨機「關係」應在1%上下。本文的定義顯然高於隨機的關係。當然貿易的雙方可以有兩個百分比。比如，美國與泰國1990年的雙邊貿易佔泰國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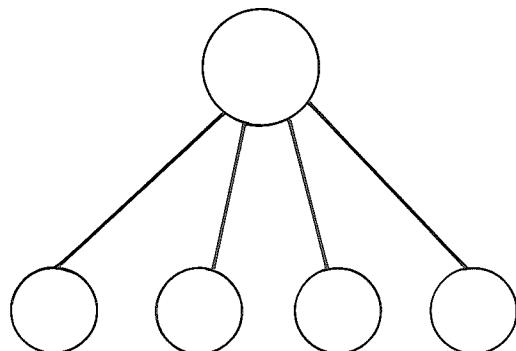
貿易的20%，而只佔美國總貿易的1%左右。是否這一貿易對美國不重要呢？20%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泰國依賴於對美貿易，二是美國商業佔領泰國貿易市場的分額是20%。因此這一貿易對雙方都重要。市場分額的佔領越來越成為貿易的重點⑪。但如果這一貿易對美國來說是赤字呢？強調「公平」貿易的美國，正好以此作為手段開拓對方市場。這一點我將在第四節再次談到。

在具體分析中，我們將用兩種網絡方法來探測集團結構、「生存空間」：(1)「集團」方法(clique)；(2)「結構地位相同組」方法(structural equivalence)(圖1)。第一種方法可用來探測多邊關係的小集團結構。比如下列兩種情況：甲、1938年英國、加拿大、中美洲英屬殖民地之間的貿易。乙、1938年英國、南非、埃及之間的貿易。由於在1938年英國的經濟地位，這類小集團結構可看作是英國集團結構(「生存空間」)的基礎。但第一種方法忽視了如下的結構：宗主國與其殖民地的「雙邊」貿易關係，比如1938年法國與其在北非和東南亞的殖民地的貿易關係。這種結構可以看做是一種衛星結構，可以用第二種

圖1 「集團結構」與「結構地位相同組」的模式



「集團結構」模式範例



「結構地位相同組」模式範例

方法探出。分析所用電腦軟件為UCINET^②。用這兩種方法探測的結果可能是怎樣呢？以下是幾種可能：(1)非強權國家參加的集團結構的出現，標誌着相對平等互換的區域貿易圈的形成；(2)大量小集團結構及「結構地位相同組」(包括衛星結構)圍繞某一強權形成，表示「霸權」結構；(3)大量小集團結構及「結構地位相同組」(包括衛星結構)分別圍繞幾個強權形成，表示分割了的勢力範圍、「生存空間」；(4)幾個強權的「空間」在有限的地理區域內相互重疊。

三 世界「生存空間」的歷史演變

從1938年到1990年，世界貿易結構有甚麼顯著變化呢？有否強權的勢力範圍與生存空間出現呢？

首先，世界結構重心(或中心)轉變。中心指數(centrality)是某國所有重要貿易關係的總合。如表1所示，美國與德國在所有三個歷史階段均在前三名中。英國從1938年的顯赫地位降到了1990年微不足道的地位。而日本在1990年顯然是崛起了。

表1 中心指數

國 家	中 心 指 數		
	1938	1960	1990
美 國	39	60	54
德 國	52	44	37
日 本	7	17	32
英 國	60	48	16
法 國	15	21	13
：			
蘇 聯			8

但研究貿易強國的興衰並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的目的是研究貿易組合結構，網絡的開放、收縮與重合。

「集團法」與「結構相同法」揭示了1938年、1960年、1990年的不同的結構。

在1938年的結構中，沒有任何相對平等的區域結構出現，62個小集團結構(最大的組只有四個國家或地區)及15個「結構地位相同組」(包括衛星結構)分別圍繞幾個強權形成。如表2所示，英國網絡集團最大，包括53個國家、地區、殖民地；美國其次，38個；德國第三，36個。日本與法國也各有自己的集團。但重要的是各個集團之間重合且在地理區域內集中。英國與美國集團重合度達63%，英國與德國達61%，日本與美國達100%。這些集團、「生存空間」在何處重合呢？如表3所示，英國與美國在西半球重合；英國與德國主要在歐洲與非洲重合；美國與日本主要在亞太地區重合。

在1960年的結構中，同樣沒有任何相對平等的區域結構出現。93個小集團結構及一個「衛星結構組」分別圍繞美、英、德形成。如表2所示，美國網絡分布最廣，英國其次，德國第三。與1938年不同的是，1960年的結構呈開放形。在1960年，不僅美國網絡在世界各大洲均有分布，而且英國與德國網絡在世界各大洲也均有分布(見表3)。我們很難用集團來形容這個時代的特點。

在1990年，只有一個小集團組不包括美、德、日三大貿易強國。這個集團組包括意大利、法國、阿爾及利亞。68個小集團結構及14個「結構地位相同組」(包括衛星結構)分別圍繞美、德、日形成。如表2所示，美國

表2 貿易圈的重合

	英 國	美 國	德 國	日 本	法 國
1938					
英國 (n=53)	24 (63%)				
美國 (n=38)		22 (61%)	11 (31%)		
德國 (n=36)			6 (100%)	2 (33%)	
日本 (n=6)	1 (17%)				
法國 (n=8)	0	0	0	0	
1960	美 國	英 國	德 國	日 本	法 國
美國 (n=58)	29 (71%)				
英國 (n=41)		31 (78%)	20 (50%)		
德國 (n=40)			4 (33%)	5 (42%)	
日本 (n=12)	10 (83%)				
法國 (n=14)	6 (43%)	2 (14%)	7 (50%)	0	
1990	美 國	日 本	德 國		
美國 (n=46)	20 (67%)	2 (6%)			
日本 (n=30)					
德國 (n=35)	7 (20%)				

n: 各貿易圈國家與地區數目

表內重合百分比計算方式: $\frac{\text{表中數字}}{n} \times 100\%$

以1938年美國及英國為例，兩國的貿易圈在24個國家與地區重合，而美國貿易圈共38個國家與地區，因此，重合度 = $\frac{24}{38} \times 100\% = 63\%$

集團最大，德國次之，日本第三。美國集團與德國集團重合只有20%，與日本卻高達67%，而德國與日本重合度只有6%。日本與美國勢力範圍的重合主要在亞太地區(70%)(見表3)。就貿易而言，美國已喪失了其對歐洲的槓桿。

1990年的結構顯示了網絡收縮，競爭集團在有限地理區域內重合的趨勢，與1938年收縮的結構更相似。而1960年則是開放的「自由貿易」結構。貿易網絡、「生存空間」的收縮發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自然，僅僅指出世界經濟結構與大戰的關聯，是不足以說明衝突是如何形成的。那麼，衝突是如何形成的呢？

四 結構收縮與重合過程中的利益衝突

與1960年的結構相比，1990年的結構更像1938年的。更有甚者，1990年的結構重現了40年代初期美國對世界格局的設想，也即「宏大區域」(Grand Area)的計劃。在納粹德國為解決「沒有生存空間」(Volk ohne Raum)的問題，而決心將英國逐出歐洲大陸，並在非洲搶奪地盤，以致用武力建立自給自足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的過程，自然引起了另一強權(美國)的關注。這一過程是「宏大區域」計劃的催化劑。

「宏大區域」計劃是由美外交關係

40年代初期美國對世界格局的設想，也即「宏大區域」計劃，是由美外交關係理事會與美政府國務院合作制定的。這項計劃詳載於外交關係理事會的歷史文獻檔案中。

表3 貿易圈的地理特點

國 家	非 洲	亞 太	歐 洲	西半球	總 數
1938					
總分布	21 (21%)	20 (20%)	29 (29%)	30 (30%)	100 (100%)
英 國	13 (25%)	6 (11%)	15 (28%)	19 (39%)	53 (100%)
美 國	2 (5%)	5 (13%)	6 (16%)	25 (66%)	38 (100%)
德 國	8 (22%)	1 (3%)	20 (56%)	7 (19%)	36 (100%)
日 本	0 (0%)	4 (67%)	0 (0%)	2 (33%)	6 (100%)
法 國	7 (88%)	1 (12%)	0 (0%)	0 (0%)	8 (100%)
英—德重合	7 (32%)	0 (0%)	13 (60%)	2 (9%)	22 (100%)
英—美重合	2 (8%)	1 (4%)	4 (17%)	17 (71%)	24 (100%)
美—德重合	1 (9%)	1 (9%)	3 (27%)	6 (55%)	11 (100%)
美—日重合	0 (0%)	4 (67%)	0 (0%)	2 (33%)	6 (100%)
1960					
總分布	28 (29%)	21 (21%)	23 (23%)	26 (27%)	98 (100%)
美 國	6 (10%)	13 (22%)	15 (26%)	24 (41%)	58 (100%)
英 國	10 (24%)	11 (27%)	10 (24%)	10 (24%)	41 (100%)
德 國	6 (15%)	7 (18%)	17 (43%)	10 (25%)	40 (100%)
日 本	0 (0%)	8 (67%)	0 (0%)	4 (33%)	12 (100%)
法 國	8 (57%)	2 (14%)	4 (29%)	0 (0%)	14 (100%)
1990					
總分布	18 (18%)	33 (32%)	28 (28%)	23 (23%)	102 (100%)
美 國	4 (9%)	20 (43%)	3 (7%)	19 (41%)	46 (100%)
日 本	4 (13%)	21 (70%)	0 (0%)	5 (17%)	30 (100%)
德 國	8 (23%)	2 (6%)	25 (71%)	0 (0%)	35 (100%)
美—日重合	2 (10%)	14 (70%)	0 (0%)	4 (20%)	20 (100%)

表中數字指貿易伙伴(國家與地區)的數目

理事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簡稱CFR)與美政府國務院合作制定的。這項計劃詳載於外交關係理事會的歷史文獻檔案中⑬。東坡(Laurence Shoup)與明特爾(William Minter)的著作首先披露這項計劃⑭。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後，CFR旋即組成研究小組，與美國國務院合作分析歐戰後的世界格局。對美國的研究決策者來說，德國獨霸歐洲，建立其勢力範圍、「生存空間」，

即「德國集團」(German Bloc)已成定局，而下一步必然是與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對抗。為此他們特別分析了「德國集團」將能控制的區域的經濟勢力。他們關心的問題是：西半球資源豐富，以此資源，美國是否能夠與「德國集團」抗衡爭霸。經過縝密的量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以西半球的資源，美國不具實力與德國在全球逐鹿。為要超過德國勢力，美國必須在亞太地區開拓自己的勢力範圍、「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對美國的研究決策者來說，德國獨霸歐洲，而下一步必然是與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對抗。

存空間」。這一生存空間即稱為「宏大區域」。這項計劃最早包括整個西半球與亞太地區，爾後又將英國攬入，作為產品消費區。

這項計劃自然與日本的「生存空間」——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相衝突。當日本武力侵華時，美國曾發出嚴重警告，但並未採取大規模行動。只是當日軍南下，直接威脅資源豐富的東南亞，並破壞「宏大區域」計劃時，美國才對日本採取了全面的經濟制裁及貿易禁運。這其中最有效的是石油禁運，因為當時日本80%的石油需要依賴美國。這致命一擊促使日本決心在太平洋與實力超過它數倍的美國決一雌雄，終於導致了「珍珠港事件」。

在這生存空間的爭奪過程中，最微妙是英美之間的暗鬥。在得知美國以50艘破舊潛艇換掉了英國在西半球所有的海軍基地時，英國議會譁然。丘吉爾嘆道：「英帝國總得要與美國結合，我並不擔憂這種結局，……我就是想阻止這個過程也是不可能的，沒有人能夠阻止這個過程，正像沒有人可以阻擋密西西比河洶湧的潮流一樣。」^⑯除此直接行動外，美國還在整個世界金融經濟制度上改制，進一步促成英帝國的崩潰，並取而代之^⑯。

1931年9月18日英國宣布退出金本位制，標誌着英國全球霸權的衰落，但非英國殖民帝國的垮台。而也恰恰因為英國退出了金本位制，解脫了對全球的金融、經濟制度的責任，英國可以騰出手來着意經營其殖民帝國。英帝國的財政結算自然是用英鎊為單位，英帝國的經濟化名則是「英鎊區」(Sterling Bloc)。正像「大東亞共榮圈」(其別名為「日元區」)一樣，英鎊區對「宏大區域」也是一大阻礙。

1941年，隨着其他強權對英帝國的挑戰，美國也趁虛而入。美援 (Lend-Lease Aid)的對等條件是取消英鎊區對美國商品的「歧視」。美國國務院決心「採用所有可能的手段」達此目的。可當時，英帝國還未虛弱到「引狼入室」的地步，自然回絕了美國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國國務院的行動也受到美國財政部的制約。到1944–1946年間，英帝國已是回天乏力了，只得向美國拱手稱臣，解除英鎊區的主要壁壘，這便是英鎊區及英殖民帝國崩潰的起始^⑰。

1990年的「生存空間」與1938年的相近，在結構上更與40年代初的美國全球戰略相吻合。這種吻合自然不能歸於巧合，但策略內容是否吻合呢？由於資料的限制，我們不可能了解內容吻合的程度。就現有的資料推斷，美國全球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襲歷史策略。里根的經濟顧問費爾斯坦 (Martin Feldstein)編著的《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一書，集中分析了美國在屬傳統「宏大區域」的南美及亞太地區所遇到的強有力競爭。美國務卿克列斯多夫(Layne Christopher)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指出：「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區域比亞太地區對美國更重要。」美國國防部的1994年–1999年階段國防計劃綱要，把日本和德國作為主要「競爭對象」(competitors)^⑱。

自然，美國90年代在亞太的勢力要比50、60年代減弱了，但其政治、經濟、軍事勢力絕對比30年代強得多。目前美國與許多亞太國家的貿易呈逆差。為了制衡蘇聯、中國，美國在60、70年代容忍了這種逆差。在冷戰後，美國宣傳媒介嘆息美國在世界地位的下降，已無能力以其宏大市場

1931年9月18日英國宣布退出金本位制，解脫了對全球的金融、經濟制度的責任，英國可以騰出手來着意經營其殖民帝國。

在冷戰後，美國宣傳媒介嘆息美國在世界地位的下降，已無能力以其宏大市場及貿易赤字繼續支撐其亞太冷戰盟友。但殊不知在宣傳的背後，美國正將貿易赤字問題作為強大的手段，繼續穩固地開拓其在亞太地區的「生存空間」。

日本在軍事上自然不能與美國比肩，但其軍費已名列世界第二，其軍民兩用工業更增強了其抗爭實力，自信心也日益增強，且能說「不」了。

英美兩國雖是政治盟友，但雙方礙於現實利益的衝突，不免暗中競逐。

及貿易赤字繼續支撐其亞太冷戰盟友。亞太地區分析家們也洋洋自得，以為美國無可救藥地衰落了。但殊不知在宣傳的背後，美國正將貿易赤字問題作為強大的手段，繼續穩固地開拓其在亞太地區的「生存空間」。美國近年的經濟增長率極低，但其增長率的70%來自外貿，其中大部分來自亞太地區。這就說明美國的「新邊疆」(The New Frontier)已移到了亞太地區。這也就是為甚麼美國不惜以貿易赤字作誘餌，等待時機，大拓亞太。前美國駐日本大使英格爾索(Robert Ingersoll)說：「我們在東亞的經濟政策應支持關貿總協定(GATT)的多邊結構，鼓勵這個地區的國家對外資及外國商品開放市場。沒有巧妙實施的壓力，我們的目的是達不到的。……這個地區的新興工業國家及日本十分依賴外貿，並且十分依賴美國市場的開放，這也就是說我們有相當大的實力與這些國家討價還價。」^⑨(其他關於貿易赤字的爭論，詳見費爾斯坦的著述^⑩。)美國迫使日本在1985年大幅度增值日元，簽訂〈半導體協定〉(Semi-conductor Agreement)以保證

美國市場分額，近年來對日採取「有效經營貿易」(managed trade)，以全面保證美國在日市場分額；用「最惠貿易國」的待遇對中國施加壓力；迫使台灣全面降低關稅，均是美國開拓亞太市場的方針的體現。「超級301」只是更明確、更迫切罷了。當前，美日雙邊貿易摩擦是新聞媒介的主要題目。但是隨着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經濟的迅猛增長，美日競爭在此地區也會日益加劇。

近年來，隨着西方經濟的停滯，亞太地區對日本也越來越重要。日本在軍事上自然不能與美國比肩，但其軍費已名列世界第二，其軍民兩用工業更增強了其抗爭實力。吸取了在太平洋戰爭中失敗的教訓，其反潛艇實力已居世界前列^⑪，自信心也日益增強，不會再唯唯諾諾，且能說「不」了^⑫。

今天的世界並沒有因為兩大敵對勢力消失了一個而變得更安全，因為剩下的一個有一種假象，覺得實力更可以有效地解決問題，比如中東石油問題。每年強權可以找到上百種藉口啟發事端。如1993年的「銀河號事



件」，假設捲入其中的不是中國，而是已能說「不」的日本，會出現何種結果呢？日本難道不比中國在貿易中更「實際」嗎？中東對日本難道不比對中國更重要嗎？

本文無意導出無論何時何地經濟外延、擴張一定會導致衝突的結論。但是擴張之後的收縮、動盪，伴隨着經濟衰退及危機卻是引起衝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 小 結

本文並非完全否認地緣政治學對衝突的解釋。可這種理論只能解釋局部性衝突（比如蘇聯在阿富汗的戰爭），而對全球性的衝突則蒼白無力。

去年年中，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又引起一陣軒然大波。這種帶有中世紀「十字軍東征」味道的靈感，與其說是對當前世界局勢的分析，還不如說是亨氏本人對當今社會特別是北美社會日益走向多元文化的恐慌。不錯，當今世界上仍存在文化的不同，但這並不意味着衝突與戰爭。亨廷頓的「文明衝突」歷史觀，根本漠視了西方的殖民征服及其戰爭的歷史事實。基於對世界經濟非系統的感覺，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觀又導出了一個結論：美日經濟摩擦與美歐的經濟摩擦同樣嚴重，而美日摩擦之所以突出是因為文化原因^②。這一點無法在我們對1990年的貿易網絡分析中找到任何證據。

當今世界上的確仍存在着小規模的中世紀式的爭鬥與意識形態，但這些都無力將整個世界捲入衝突的漩渦之中。即便是被大大誇大了的穆斯林

原教旨主義，也只是主要針對社會內部經濟發展停滯的意識形態，而非對外擴張的理論。而有能力將整個世界捲入衝突的，是在整個世界系統中具有實力並且十分「現代化」了的角逐者。在「和平」的經濟利益角逐中唯恐自己敗掉，又忌諱赤裸裸的「利益」二字，於是又有「美國、日本、德國是不同的（也即衝突的）資本主義、不同的文化」之說^④。冷戰之後學說之多讓人眼花繚亂，但甚麼是世界範圍內可能衝突的主要動因呢？大衝突是否可以避免呢？本文初探了第一個問題，對第二個問題卻是沒有答案。

當今世界上的確仍存在着小規模的中世紀式的爭鬥與意識形態，但這些都無力將整個世界捲入衝突的漩渦之中。而有能力將整個世界捲入衝突的，是在整個世界系統中具有實力並且十分「現代化」了的角逐者。

註釋

① William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Douglas MacArthur* (New York: Dell, 1978), p. 186.

② H.W. Arndt: *The Economic Lessons of the Nineteen-Thirties* (London: Frank Cass, 1944/1972).

J.B. Condliffe: *The Commerce of Nations*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 1950).

Albert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3).

③ D. Snyder and E. Kick: “Structural Position of the World System and Economic Growth: A Multiple Network Analysis of Transnational Intera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LXXXIV, 5 (Oct. 1979), pp. 1096–1126.

④ R. Breiger: “Structures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mong Nations”, in P. Blau and R. Merton

- (eds.), *Continuities in Structural Inqui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1).
- Roger Nemeth and David Smith: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World-System Structure: A Multiple Network Analysis", *Review*, VIII, 4 (Spring 1985), pp. 517–60.
- David A. Smith and Douglas R. Whit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the Global Economy: Network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1980", *Social Forces*, 70(4) (June 1992), pp. 857–93.
- ⑤ Immanuel Wallerstein: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World System after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0, no. 1 (1991).
- ⑥ Albert Bergesen: "Communism's Collapse: a World System Explan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vol. 20, no. 1 (Summer 1992).
- ⑦ *New York Times*, July 7, 1993.
- ⑧ Hirschman, 1969.
- ⑨ League of Nations: *The Network of World Trade*. 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Secretariate, Financial Section and Economic Intelligence Service (1942).
- ⑩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60, 1991),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 ⑪ Martin Feldstein (e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Econom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 ⑫ Stephen Borgatti, Martin G. Everett and Linton C. Freeman (1991), *UCINET IV*, version 0.35.
- ⑬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40–1945), *Studies of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War and Peac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eries* (New York: CFR).
- ⑭ Laurence Shoup and William Minter: *Imperial Brain Trus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 ⑮ H.G. Nichol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 95.
- ⑯ Fred Block: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 A Study of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7).
- Randall Woods: *A Changing of the Guar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1–1946*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 ⑰ Fred Block (1977), pp. 32–69.
- ⑱ Christopher Layne and Benjamin Schwarz: "American Hegemony—Without an Enemy", *Foreign Policy*, no. 92 (Fall 1993), pp. 9–10.
- ⑲ Robert Ingwersen: "East Asia and the U.S. Economy" in Feldstein (1988), pp. 141–51.
- ⑳ Martin Feldstein: "Correcting the Trade Deficit", *Foreign Affairs* (Spring 1987).
- ㉑ George Friedman and Meredith Lebard: *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 ㉒ Shintaro Ishihara (translated by Frank Baldwin): *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 ㉓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p. 34.
- ㉔ Jeffery Bergner: *The New Superpowers: Germany, Japan, and the U.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蘇鐵丁 1982年畢業於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理工大學），1989年獲美國麻省大學博士學位後，赴加拿大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McGill)執教。論文散見於各學術雜誌。現主要從事分析世界政治經濟結構網絡及其歷史的演變。